



第一 First Words 言论

——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
战略思考

人民论坛◎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文化产业：莫把规划当闺话

一个规划，参与制订的人越多，就可能越全面、科学、合理；同时，由于在制订阶段就凝聚了各方的智慧和意见，执行起来也会顺畅得多，执行效果也会好得多。要想把中国的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做精、做好，必须要有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在里面。如果只是一部分人利用工作之便，相对封闭地制订了一个规划，使文化产业规划成了少数人之间的闺房密语，那么它的科学性、权威性、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实施效果就会让人担忧。

文化产业：莫把规划当闺话	145
当下文化处境忧思	148
市场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手段	151
关注打工者的文化力量	154
风俗是如何转变的	157
对口号误读的思考	160
历史的品位与口味	162
“围观”类型与国人心态	165
“快”与“慢”的哲学	168
何谓战略知识分子	171
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	174
“北约”PK“华约”：招生权求解	176
你能接受教育差别吗	179

第一言论
——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治的“公共性”方面才刚刚起步，所以，所谓“中国式民主”的说法，并不表明中国已经具有了另一种定型的民主版本的现实性，充其量仅仅意味着中国政府旨在化解大众参与压力，进而实现“民主治理”目标方面的可能性。不墨守成规，不刻意追求与别人的不同，以务实态度为原则，以现实问题为出发，以改善治理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用改革创新来丰富民主之意涵，这恐怕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唯一出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

党国英

中国改革的使命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总结已经完成过渡的历史经验，改革的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现笔者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谈点看法与认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核心是公权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其中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的适度自治问题。过去我们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以为一提自治，就和“联邦制”这类政体有关。其实，地方自治是一切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只是自治程度不同而已。欧洲一些国家至今仍然在推进地方自治。自治在我们国家被称为扩大自主权。

从一般规律来讲，自治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成本成正比，与决策所涉及的公共性成反比。信息成本越高，相应的决策权越应下放给基层



政府创新的不同版本

燕继荣

在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的后发展国家，政府创新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也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是不是任何形式、任何性质的“政府创新”，都要照单全收？当我们把政府定义为代表公共利益恪守公共准则的管理机构的时候，我们应该无条件地为政府创新投上一票。这也可能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基本立场——因为，至少“创新”总比“无为”要好，特别是对于处在变革当中、社会对于“改革”又充满期待的政府而言更是如此。

但是，政治学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政府是一个官僚机构，它不仅傲慢，而且还有自己的利益。它也不过是一个“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判断和认识存在于诸如“帕金森定律”、“公共悖论”、“官僚经济学”、“寻租理论”、“政府规制理论”、“政





在美国某些最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的支持与教唆下，华盛顿方面正在鼓吹一项双边解决方案——要么人民币大幅升值，要么大面积地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解决方案能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吗？还是政客们转移民众注意力的一种魔术手法？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的准确数据和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的原因。其实早在1994年，第八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曾设立统计小组对双边货物贸易统计差异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货物从中国经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区）转口运输，是造成中美双边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尽管两国均按照相同的国际准则开展货物贸易统计工作，但双方相应的出口和进口数据未必相符。贸易伙伴国的属性差异和转口增加值，是导致中美间接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美贸易逆差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增加曾导致美日贸易的逆差。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原本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进口的贸易不断被中国所取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的逆差自然不断扩大。美国在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中，将目标锁定经济迅速成长的中国，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重新估值。美国今年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在新一轮政治周期中开始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试图迫使美国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实际上，正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鲍泰利指出，就事实而言，很难认定中国操纵汇率。

再次，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逆差的局面，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低储蓄率。根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等人的测算，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0%，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仅会上涨4%，根本不足以产生使需求回到美国货的重大转变。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马丁·贝利和罗伯特·劳伦斯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固定的外汇汇率、低工资或出口补贴，而是被美国国会忽视的储蓄率问题。2010年3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迈克尔·舒曼

富人治村的“美”与“险”

郑风田

“富人治村”最近又有新的动向。近年来，浙江、重庆、吉林等地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一现象被称作“老板村官”，其间引发不少争议。正面的看法是认为老板富人开始回报社会，捐款修路；老板有致富经验，帮助百姓富起来。负面的看法是认为富人靠钱开道，拿出去多少就要在当上村官后捞回多少，从而带坏民风。根据笔者的调研，“富人治村”看上去很美实则危险，而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险”的趋势更加凸显。

“富人治村”已在早期的试水点产生公信力问题。据报道，我国国内最早试水“富人治村”的是浙江义乌，但很遗憾的是，目前“富人村官”已普遍遭遇信任危机。据义乌市检察院负责人讲，目前“富人村官”不整顿不行了，出事的村官一个接一个。在村官选举前，很多想当



择官问题中的技术因素，只想强调技术解决有其界限，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背景所提供的空间。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GDP陷阱”种种

GDP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把GDP的效应无限放大，就会走进“GDP陷阱”。中国总量世界第二，比一般发达国家多得多，但人均排名却很靠后。人均是一方面，还要考察地均和天均，即每平方公里的GDP和GDP对大气的污染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GDP时还要看分配占GDP的比重。分配不公是GDP掩护下的大陷阱。分配不公将带来道德滑坡、犯罪率提高以及社会的无序。

公平是精神能源，只要能克服了GDP崇拜，跳出GDP陷阱，把公平正义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中国就会“一轨九州，同风天下”。

第一言论

——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其四，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农业污染成大户的根源还在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造成“负外部性最大化”。

农村环境的高污染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不断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只有正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治理措施和法规制度的多样性为出发点，才能真正解决农村环境污染这一复杂的现实性问题。需要采取系统的综合防治战略才能真正治理污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第一言论
——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精神依托的对象。而对于今天处于巨大变革的每个中国人来说，根本的挑战在于如何给过度物质化的生活找到稳定的精神家园，重建能让整个社会风气升华的精神生活。这不仅要依靠每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的引导和规范。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组织的高层常常掌握更多的组织资源，可以用来对下属进行奖赏或惩罚。显然，带去好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愉悦的情绪体验，当然有可能得到奖赏；而带去坏消息的下属，总是给上级带去否定的情绪体验，当然更有可能得到惩罚。可以想像，好消息一定会像长了翅膀一样源源不断地飞向上级。每一个层级如同一个变压器，向上传的好消息不但能迅速通过，还会被层层放大；向上传的坏消息则会层层压缩、删减或者干脆不让通过。

上层完全为好消息包围的组织，是个不健康的组织。

我们揭示上层为好消息环绕源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推导出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在承认人趋利避害本性的基础上，寻求让坏消息上传的制度安排。那又有谁愿意去充当上传坏消息的“乌鸦嘴”呢？

人的本性趋利避害，导致坏消息难以上传。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样利用人趋利避害这一本性，设计传达坏消息而获利的制度安排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实古代的言官系统，就是类似的制度安排，即使不因传达坏消息而获利，起码不至于获害。

设计传达坏消息的系统，我姑且称之为乌鸦嘴系统，其成长发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要相对独立于组织的层级体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宪政架构下，最有可能担当“乌鸦嘴”功能的是媒体和知识分子。

媒体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层级，有其独立的赏罚体系。捕捉大众的眼球，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是媒体发挥社会功能的独特方式。有时坏消息常常更能吸引大众，显然，这里乌鸦嘴功能对媒体来说是利而不是害。知识分子无不追求其知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对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和揭露有时更能扩大其社会影响，“乌鸦嘴”同样有可能带来的是利而不是害。

所以，重要的是政府与媒体和知识分子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良好互动的前提是相对独立的地位，如果后者完全消融在前者的体系架构当中，其乌鸦嘴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





好，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在探索中，不能说已经有了什么模式。这后一种意见似乎更有道理。每一个置身改革开放大潮的国民，都会感知我们取得的傲人成就，也都能够看到脚下通往理想社会的路还很远很长，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滞，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更须配合而行。前进过程的一大堆困难、矛盾，甚至种种不测的问题在考验着我们，只有拿出闯地雷阵、赴万丈深渊、风雨不倒、至死方休的决心和意志，才能闯关建功。如果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甚至畏缩、倒退，那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邓小平同志生前讲过的重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思量。

过去我们历史教学有太多的形而上学，把历史规律似乎讲成了必该如此的宿命论。其实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往往表现为一种总趋势，而具体的历史道路是多种多样、事在人为的，其选择性的天地十分广阔。我们常常对外国来宾说，尊重他国人民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又说我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这没有错。但是评说历史应该注意：不能拿历史结果的一种事实来论证历史事物的全部，“一次选择，永远拥有”只会出现在夸张的商品广告词里。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就是国人不断探索、选择自己前进道路的历史。人民群众有这种探索、选择以求至善的权利和自由。有鉴于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今年，习近平同志又特别指出“权为民所赋”。执政党只有敬畏人民的选择，尊重百姓的意愿，顺应历史的潮流，兢兢业业、严以律己，把人民赋予的权力掌好用好，才能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还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历史评说，是当代人以当代的立场、情感和价值取向对历史的再评估。近现代史研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它离当



看做得如何，俗话说“回头看”，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过程。这个“回头看”的过程，应该是贯穿于整个做事的过程当中。管理学将管理过程划分为所谓的“计划制订—组织实施—反馈评估”等环节，那实际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不是说每做一件事都要有一个独立的评估阶段。“泛评估主义”则是把这种更多属于理性抽象的“反馈评估”环节孤立化、绝对化。

当然，独立的评估过程不能不存在，尤其是对比较重大的活动项目而言。但是，应该看到贯穿于整个实践过程的评估是更重要的评估。现实的管理过程中几个环节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很难绝对地区分开。有人用德鲁克“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的论断来为自己的“泛评估主义”辩护，其实，笔者认为德鲁克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是对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凡事都要有一个孤立的、独立的、界线分明的评估阶段，那只是书生之见，是形而上学观点，一点辩证法都没有，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是那样发生的。

“泛评估主义”的认识论除了把评估阶段孤立化、绝对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把评估的数量化给神化。数量化是人们理解事物的一种美好追求，但是如果将数量神化反而会曲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物或者事物的有些方面难以数量化，比如对人的道德品行、忠诚度等方面，数量化就十分困难。量化同样有个成本的问题，我们可能用成本非常低廉的方法已经了解某事物90%的特征，但是要了解剩下的10%可能要花上比原来高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成本，那你还会做这个评估吗？显然，就不应去做如此奢侈的评估了，当然科学研究除外。

说到此，读者或许以为笔者是一个评估的反对者，非也。笔者是要把评估从“泛评估主义”的神坛上拉下来，让其回归工具位置，笔者的观点是，能融入工作过程当中，不要轻易将评估环节独立出来。德鲁克关于决策的一个观点用来谈论评估问题同样十分贴切：作出决策前先问是否真有决策，有时不决策可能是最好的决策。在评估之前，先问问“是否真需要一个独立的评估环节”那才是明智。评估指标体系的设



第一言论

——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



益，就有了价值，才会有尊严；反之，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只要社会高速发展，就一定会有尊严感的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消费与就业困境新解

丁元竹

缺乏创新思维和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是中国经济长期走不出“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说到消费不足，就说收入分配不合理；一说收入分配不合理，就说社会保障水平低，云云，一直在经济领域打转转。

眼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正在退去，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回首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痛定思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更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而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分工和提高专业化水平，培育新的发展部门。

培育新的部门意味着加强社会分工。经济社会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而进行的，社会越是发展，社会分工的程度必然是越深化、越细化。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共领域的出现和扩大也





营企业，切实有效的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等问题。

第五，着力调整劳动力结构。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又一个亟须解决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即对技术工人、特别是熟练技工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却跟不上形势，以至于缺乏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而迫切需要技工、特别是熟练技工的企业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这种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它已经在中国出现，估计今后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要缓解就业压力，必须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对职工加大培训力度。劳动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可以使更多的人找到工作岗位。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